江苏启示录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点睛

思想解放 即人的解放

在对改革进行回顾、总结、反思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回到了当时的起点。

发轫于30年前，为改革开放作准备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其目的和导向十分明确，就是要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的现代化扫清道路。这是一场走出文革阴影的启蒙运动：它重新提倡科学、民主、理性，大力批判文革中盛行的现代个人迷信、以“全面专政”为口号对人民群众的镇压、以“世界革命”为幻想的“唯我独尊”和被围困心态。这场运动的背景和内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同，但在精神上是对五四传统的认同和回归。

思想解放就是从神回到人，从外在的、远离人的目的回归人本身。如果要问“思想解放何以可能？”回答是：这没有什么高深和神秘的东西，只要我们忠于生活，忠于并固守我们的本性。解放思想和科学发明、发现不一样，不是依靠高智商去揭示世界的奥秘，它只是要求人们不要盲信偶像和权威，如实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说话和办事。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要求回到常识，如果我们处于常识和常理被歪曲的时代或情况之中，我们需要的只是纯真和勇气，而不是高深的知识和智慧，就像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小孩一样不假思索地高叫“皇帝本来就没有穿衣裳！”

思想解放是人的解放，就是从人之外的状况、从非人的状况回到人自身，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中国理论界在破除“两个凡是”和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被视为大逆不道和惊世骇俗，并不说明这个问题在认识上有多难，只说明我们曾经愚昧到什么地步，我们的人性丧失到多么可悲的地步。

30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一般认为思想的分野是改革与保守，最高层领导和下层群众是要改革开放的，而许多干部因为习惯、因循守旧，因为怕改革触动自己的既得利益，是保守的。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公开反对改革的力量和主张不明显了，原因一个是改革发展壮大了，它的势头不可逆转，二是许多人发现，改革不仅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反而使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处大大增加了。由于改革要实行放权让利，他们的权力受到的监督和约束少了，由于行政审批制和价格双轨制，寻租活动和权钱交易的机会增多了，他们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相反，对于一般群众而言，他们承受了改革和制度转换的压力与代价，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他们的改革梦想部分破灭了。问“要不要改革”已经没有意义，问题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

在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的前提下，反思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在反思和总结改革时，我们要不断回到思想上的原点，问一问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全体人民的福祉，还是单纯的经济增量和经济效益？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真正的改革、人民的改革。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著名学者）

■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我的观点没什么特别，只是常识

■按当时的情形，不能直接批『两个凡是』，我就给它找了个替身

胡福明：说出常识 比发现真理更难

快报记者 倪宁宁

提起改革开放，人们不会忘记一个人——胡福明。30年前，他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今年，许多媒体不约而同地都把他列为30年改革开放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什么会是胡福明？30年过去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会出现在当时“思想并不很活跃”的江苏，会出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哲学老师之手？30年过去了，让我们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些不可复制的历史细节会告诉我们答案。

我不会在任何人的责难面前退缩下来

——哥白尼

一个孤独的思考者

像往年一样，1977年的6月虽然只是初夏，但南京已经是个“火炉”。傍晚时分，一身是汗的胡福明从“书桌”前站起身，和爱人打了个招呼后，手里摇了把扇子走出家门。刚刚吃过晚饭，他得把家里唯一的一张饭桌兼书桌，让给正在读初中和小学的女儿和儿子。

刚走出家门几步，他就把烟点上了——一毛钱一包的“雪峰”。胡福明对烟的牌子不讲究，只要能抽出烟味就行。他不是不想抽好牌子，可是对他这种一天接近三包的老烟枪来说，一个月60元出头的工资，容不得他有任何奢侈的念头。

走下南大15舍的水泥台阶，穿过三四米宽的一条水泥路，他径直走进了“二号新村”。北京西路二号新村也是南大的宿舍区。胡福明喜欢在“二号新村”散步，这里散落着十来幢宿舍楼，楼前楼后种满了玉兰、石榴、蔷薇等植物，空气清新。

“这里的环境有利于思考。”当年住在二号新村的南大老师们，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他：一件白背心，一条大裤衩，一把芭蕉扇，在院子里晃来晃去，当然手上少不了烟。没人特别留意他。在南京，在南京的夏天，被闷热逼出家门、不修边幅的男人比比皆是。

但，这个男人不一般。这个男人的脑子里正酝酿着一场风暴，而这个风暴将在不远的“将来”席卷中国。

1977年夏天，胡福明42岁，经过几个月的斟酌，关于“真理标准”的思考几近瓜熟蒂落。

一场特殊的悼念

1977年2月，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抛出，为正在进行中的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一带有标志性特征的“事件”很自然地成了胡福明思考的起点。

可为什么思考的是胡福明，不是别人呢？

30年前，胡福明成功地“搞定”了真理以及真理标准的种种界限和联系；3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结论不是事实的简单堆砌，但一定来自相关的事实。

让我们把时间稍稍提前到1976年，看看那年冬天，以及稍后的早春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

当时，在系总支书记葛林和胡福明（系副主任）带领下，南京大学哲学系的30多位师生正在无锡农村开门办学。所谓开门办学，就是把教室搬到工厂车间、农村地头，师生们白天干活，晚上到工人、农民中间搞调查研究。“我们当时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仓库里面堆了不少农民做的棺材板，还有一些空棺材，我们就睡在棺材板上面。”30多年以后，一头白发的胡福明，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

他们是早晨6点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得知总理逝世的。

“当时就蒙了。”教授《资本论》的原南大哲学系教师姚诚回忆说，虽然大家知道总理身体不好，但还是觉得太突然了，“我们可是把希望都寄托在总理身上了。”他们强忍悲痛，去镇上买回来一根长竹竿和一面国旗，就在仓库门口降了半旗。正当师生们准备进一步悼念总理时，从上面传来了“不准戴黑纱，不准开追悼会”的通知。“师生们都很气愤，就找到公社党委，双方一商量，就在公社的礼堂布置了一个灵堂。”胡福明说，学生们买了很多松柏枝，扎花圈，“当时大家都寄希望于总理。‘四人帮’反总理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他们批林批孔就是批到总理头上去的嘛。他们要批的大儒就是总理嘛。所以我们都十分痛恨‘四人帮’，上面越是禁止，我们就越要干。”

从不满到反抗

布置灵堂悼念周恩来，体现了哲学系师生对周恩来的朴素情感，也表达出了他们对“当权者”的不满。这年春天，在南大，在南大哲学系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更体现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反抗。

这年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在刊载新华社的一篇新闻稿时，露骨地删掉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中公然把周恩来打成“走资派”。文中写道：“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3月26日，南大的学生把25日的《文汇报》贴到了黑板报上，并把那句话用红笔勾了出来。3月28日，被激怒的南大学生抬着总理的遗像，走上了街头。南大的师生集体到雨花台和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南京到处可见反对“四人帮”的标语。

“我系学生都去了，哲学系的队伍很长。”胡福明回忆。

“有天早上，有一个学生拎着糨糊和标语，在校门口碰到哲学系的舒海青老师，问今天去哪里，舒海青说去火车站。”时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葛林介绍说，舒海青把学生们领到火车站，用熔化了的沥青，把反对“四人帮”的标语刷到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车厢上。

还是在那段日子，南大哲学系还发生了一起所谓的“发革命演说”事件。

3月29日的下午，哲学系教师郁慕镛应邀到南京图书馆讲授哲学课。

“我是骑车去的，一路上看到游行的人群和街上的标语，内心很激动，这是外因；内因是我心里一直就对批邓不赞成，邓小平出来工作后，恢复生产，整顿秩序，效果很好啊。”到了南图后，情绪激动的郁慕镛甩开了讲稿。因为不能公开对抗“批邓”，他就很策略地对听众说，“党中央要求我们排除干扰，牢牢掌握‘批邓’的大方向，《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就是想转移斗争大方向。干扰就来自《文汇报》。”结果，当天有个南大的干部没事来听他的课，吓坏了，就向校党委报告，说郁慕镛在进行反革命演说。校党委立即派出了工作组到哲学系。哲学系两个协助调查的老师向工作组汇报说，“郁慕镛总体上还是‘批邓’的，他最多是犯了错误，不能定性为反革命。”一番解释，把他保护了下来。

南大哲学系：一个特殊的小环境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们的思想比较活跃，长期以来，他们在内心中无法接受‘左’的错误思想，但公开场合不敢反抗，只能在私下里议论。”在1998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拨乱反正》（江苏卷）一书中，有一段对南大哲学系教师在文革期间的评价。

“在农村劳动时，晚上没有事，又没有读书的地方，关了灯就说黑话，聊天。当时哲学系老师、师生之间关系非常密切。用历史故事‘含沙射影’地批判江青，比如吕后要做女王之类。师生之间不会告密，这一点没有问题。”

南大哲学系成立于1960年，在恢复高考前被称为政治系。政治系主要是讲授马列原著。“可能是因为本职工作就是和思想打交道、研究思想的，我们系的思想就比较活跃。”和胡福明一样，葛林在文革初期就曾经被造反派打倒，1974年恢复工作后，他担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直到1980年代初被学校指派筹建经济系。在他看来，哲学系的老师很团结，而团结的原因主要还是观念一致。“大家都是学哲学的，看问题比较辩证，对‘文革’看法的转变是很正常的。”

姚诚在哲学系以敢讲话著称，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和许多老师一样跟着走。“匡亚明校长被打倒了，我们心里接受不了，可还是跟着走的。”姚诚说他对文革有看法，主要是缘于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以及对苏联几个美学家、文学家的批判上。“那些书我们都看过，都是好书啊，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变成黑书了呢？从那时候起，我们几个同志就认为这个运动过头了。”受访的几位哲学系老师也都无一例外地表示，即便是在文革派性最严重的时段，哲学系内部也没有派别之争，“哲学系就是一派，彼此很团结。”

有不同意见，老师们习惯到系总支办公室去交流。如果谁“出了事”，系领导总是出面保护。

“哲学系是南大的思想重灾区，捅的娄子很多。有一个时期，竟然一下子发生了‘七大案件’。”葛林介绍说，总理逝世后，因为系里频传“总理遗言”，结果招来了7个公安人员。最后都被他和胡福明巧妙化解了。“最难办的是姚诚，别人传话，都能找到出处，把‘责任’甩了，到他那儿却说不清了。”葛林说，有一天，公安人员在系办公室坐等姚诚来解释，“我们赶快派人去他来学校的几条必经之路截住他。”

姚诚回忆说，“我当时住在南工（现东南大学）宿舍。系里派了几路人来拦我，我可能走的路都被系里的人‘堵’上了。遇到我后，他们就教我找一个无法查实的源头，比如说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厕所里听说的。我后来也就是这么对公安说的，也就通过了。”

姚诚在文革中，还被怀疑是“大鲨鱼”（反动分子），学校的工宣队下来调查，结果系里的老师保护他说，如果姚诚是“大鲨鱼”，那我们都是“大鲨鱼”。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毛泽东说。

胡福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思想，它也一定是从实践中来的，而这个实践，从某个方面来说，也包含了“思想活跃的南大哲学系”这个特殊的小环境对他的影响。所谓物质决定意识，所谓时势造英雄，“思想活跃的南大哲学系”为他的独立思考多少提供了些许宝贵的精神支持。

“如果他不在哲学系，有可能就写不出来。”姚诚的玩笑话说得不无道理。

为什么是胡福明？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7年2月，把目光聚焦到胡福明身上。

“我天天读报纸。我学新闻出身，一贯关心国家大事。文革中被打倒以后还天天看报纸呢。而且特别注意社论，因为社论是代表中央的。读到两报一刊的社论后，我感到很惊讶。怎么能这样说呢？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文革的理论路线、重大决策都是毛主席提出的。文革时的中央文件必须要他圈阅和同意。他们这样一说，还搞什么拨乱反正啊？”粉碎“四人帮”以后，已经在南大学报上发表了两篇批判文章的胡福明决定批倒它。

怎么批呢？胡福明首先研究了“两个凡是”的本质，发现它违背了“实践论”的基本观点，它是脱离实践来看认识问题，脱离了实践标准来谈真理问题。它的本质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找到“靶心”后，他决定拿实践检验的标准来攻它。“按当时的情形，不能直接批‘两个凡是’，那我就给它找了个替身——林彪的‘天才论’，它不过就是‘天才论’的翻版嘛。它们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胡福明认为，没必要直接点名，那些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一下子就会看出来，看到了，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的观点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什么创造性，在哲学界，这就是个常识。”但写作和发表这样的文章是需要极大勇气的，甚至需要冒着坐牢的风险。

不过在胡福明看来，勇气倒是简单的事了。“中国的历史发展已经到了这么个地步，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还能搞文革啊？文革错误的理论政策还能延续下去啊？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啊？那中国不完蛋了吗？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许多中国人仍然在蒙受冤假错案，仍然戴了帽子，仍然还坐在监牢里面，那些蒙冤者的家属多么想获得平反昭雪啊。中国人过的是多苦的日子啊。一个月吃半斤肉、半斤油。物资严重匮乏。民不聊生啊！中国经济在世界要排在末尾啦。”胡福明说，“我们这些人心里面有一个情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责任感。我们这些人是人民，是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我是贫下中农子弟。我家里的地一半多是土地改革分来的。我从解放后上初中开始，就没交过学费。如果要交学费，我根本上不起学。我上的高中是师范，师范就是吃饭不要钱的，不要学费也不要书费。我读北大、人大，都靠助学金，我要报恩啊。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才学它，相信它是科学是真理。真学真信，还要用啊。”这么一路想下来，胡福明觉得自己就必须要做这件事。“哪怕坐牢，我也准备去啊。再加上我刚好抓住它了，我不砍它行吗？”

“我们那时候主要是说‘黑话’，互相之间讲得比较多，老胡这个人比较稳重，他把要说的话都放在了脑子里。”姚诚分析，胡福明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他考虑的是大问题。

“虽然真理标准在哲学上不是问题，我们都知道，可是在当时那个气候下，真理标准在政治上是个大问题。”姚诚直言胡福明有胆量，不容易。

而这种胆量，除了勇敢，还有看问题的敏锐和解决问题的智慧。

这就是胡福明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一人做事一人当

从二三月份开始“找靶心”，5月份下定决心写出来，六七月份开始找资料、写提纲，到8月份完稿，寄给《光明日报》，胡福明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出于安全考虑，他没有对爱人、对哲学系的同事说这件事情。他考虑的安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同事。“为什么不说？怕株连人家嘛。真要坐起牢来，一抓一大批，大家一起坐牢啊。文革中的教训还少吗？”胡福明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天塌下来他倒霉就是。

胡福明的话让人想起哈姆雷特。那个被“生存还是毁灭”困扰的王子在舞台上喃喃自语：这是一个颠倒乾坤的时代，倒霉的我却要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接下来出现的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抽一毛钱一包的雪峰，一天抽两三包。15舍是个筒子楼。一层大概有30多个房间。一家一间，每间十六七个平方米。每一层楼有两个卫生间、三个厨房，一个厨房好多家人公用，洗澡都在卫生间里。那时候大家都用煤炉，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整个宿舍乌烟瘴气的。

胡福明一家五口。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这张桌子是饭桌，同时也是他和两个孩子的书桌。每天吃过晚饭，他就出去散步，一方面让脑子清醒清醒，一方面给孩子做作业腾地方。那时候，没有电视，大家睡觉都比较早。等孩子和爱人睡觉了，他就打开台灯，继续忙他的“真理标准”。

有一个细节，很多媒体都披露了。就是那年6月下旬的时候，他爱人在工人医院住院开刀。他每天晚上都要去陪夜。爱人睡着了，他就在医院的走廊里看书，写提纲。

“写一篇文章是很艰苦的，要定题目，找材料，要推敲，组织论点。”在江苏省政协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里，穿过30年的岁月，胡福明仿佛看到了那个30年前的自己。

虽然这篇文章最终如他所愿，一举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并且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可胡福明还是觉得有些许遗憾，“这篇文章文风不好，引用了很多语录，打的是语录战。”

过河的卒子

文章9月份寄出去以后，经过多次多人修改，经胡耀邦亲自审定，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5月11日，终于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正式发表。

一般来说，文章发表对作者来说是个安慰。可是胡福明的心里却惴惴不安。当时国内政局并不明朗，“两个凡是”的力量还很强。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迅即作出反应，表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

有一个细节，经过时间的沉淀，如今已经成为经典——文章发表后，有一天，胡福明和姚诚走在南大哲学系，也就是西南大楼的台阶上。胡福明对姚诚说：“这文章闯祸了，我要做思想准备了。”作为10多年的好友，姚诚安慰他说：“老胡，不管怎样，你已经是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

胡福明说，那段日子，他所能做的是继续工作，继续教学，继续读书，然后冷静观察，准备迎战。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思考和准备以及写作这篇文章时，胡福明在南大，乃至在家里，都是一个“孤独的战士”，但是文章发表后，在南大，在哲学系，他得到的是来自领导和同事、学生的关心和支持。

匡亚明校长见到他说，文章写得不错嘛！系总支书记葛林在系里明确表态：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坚决支持他，和他站在一起。5月中下旬的时候，郁慕镛从北京开会回来，给他带来了让人宽心的北京“最新消息”。郁慕镛还不止一次地在系里的会议上说：“就凭这篇文章，老胡就应该评教授。”

几乎所有哲学系的师生都支持他，支持这篇文章，这让他感到很宽慰。

而事实上，北京确实有人来南大，来哲学系调查胡福明，声称这篇文章是砍旗的。葛林介绍说：“我们告诉他们，老胡的出身和为人都没有问题，他写这篇文章也没有任何背景。”

在关键时刻，哲学系显现出它一贯的作风——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的老师。

一个人要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

胡福明没有坐牢。

邓小平于同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这篇文章的观点表示明确支持，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这个讲话有力地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展开。

同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008年12月的一天，73岁的胡福明对43岁的胡福明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的作为就是两句话。第一，我抓住了‘两个凡是’，认为它是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要拨乱反正就要破两个凡是。第二，我用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集中全力去批判两个凡是，整篇文章都解决这个问题。”

结束采访前，记者请他谈谈对青年人的期望。

这个满头银发的人大声说：“一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一定要有独立思想，要有独立的人格，要做顶天立地的人，要对国家人民负责，干吗精神上要做奴隶啊？”

☜ 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庆典中，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第一次亲切地直呼领导人的名字，也把符号化的领导人还原成了一个鲜活的人。

胡福明说出了常识，中国思想解放掀起了风暴。

30年流行语录

1982年

一国两制

1982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来访的美国华人时指出，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一国两制”概念的第一次明确提出。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1982年袁庚将其竖立于深圳蛇口工业区之时，曾引起轩然大波。直至邓小平表态，争议方才烟消云散。标语一时风靡全国，成为改革开放响亮的口号，透露了一个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态。

1983年

难忘今宵

从1983年除夕夜开始的这桌“文化大餐”，吃到今天，早就腻了。说春晚跟年夜饭、放鞭炮一起成了大年三十的老三样“民俗”，一点儿不假：俗得可以，可谁敢说就能免俗？

向张海迪学习

1983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张海迪的长篇自述《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向张海迪学习”，高位截瘫的张海迪成为一代人的榜样。

1984年

小平您好

1984年10月1日，参加国庆游行的一批北大学生为了表达对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的感激之情，打出了自制的横幅，上书“小平您好”，这句对领导人最朴实的问候，打动了亿万国人之心。

下海

1984年，“下海”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词。这一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波下海经商的热潮，很多人靠留洋打工、倒腾紧缺商品先富了起来，成为社会羡慕的对象。人们纷纷加入经商大潮，一时间，个体户、出租车司机等成了备受青睐的职业。

零的突破

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许海峰以手枪60发慢射项目的冠军，成为了本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获得者，更是中国在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枚金牌的获得者。

责编:赵勇 美编:侯婕 组版:杨建梅